

暗夜里的过客

一个你所不知道的鲁迅

吴俊 著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出版集团

夕阳下独行的过客想要抵达的是超越了坟地和野花的无穷之远的远方。虽是无穷之远的远方，但他惟一的选择仍是决不回转去的前行。



暗夜里的过客

一个你所不知道的鲁迅

吴俊 著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夜里的过客:一个你所不知道的鲁迅/吴俊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1

ISBN 7 - 80186 - 410 - 7

I. 暗... II. 吴... III. 鲁迅 (1881 ~ 1936) - 人物研究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5205 号

策划编辑 李丹梦
责任编辑 李洪义
装帧设计 王小阳

暗夜里的过客——一个你所不知道的鲁迅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95 千

印 张: 20 插页 2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86 - 410 - 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 版 自 序

重新出版自己十五年前的作品，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至少不能单纯用高兴之类的字眼来概括。因为正是这本书的重版，使我再次发现了时间的流逝是那样的无情。十五年，意味着我早已离别了年轻的岁月，或者说，我早已被自己的年轻时代所抛弃。而这本书在几乎所有的意义上，都代表了我的年轻时代。它的重版无疑加深了我对现在的沉重感觉。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和时间的价值相提并论的。旧著新版的喜悦并不足以抵消我对逝去的年轻岁月的怅然追思。这样的十五年不会再有了。

回忆当初，这本书的写作对我是有拯救作用的。从读书的届（级）别上说，我属于1986年冬季入学的博士研究生，但实际的学期开始，则在1987年1月。这样，我本应在1989、1990年之交毕业。可是，整个的1989年，我一直深陷在时而狂热、时而颓丧的不定状态中，根本无法执笔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越到后来，心情就越加郁闷。虽然每天其实都无所事事，但就是百无聊赖，不想动笔。终于申请延期毕业。

1989年的圣诞之夜来临了。我靠在宿舍的窗前，黑暗中听到了不远处室内体育馆里传来的音乐声，那里正在举行圣诞舞会。渐渐地，我意识到窗外匆匆的人影和急切脚步，都是朝那里而去的。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到心底里的某种东西苏醒了，我有了想要写作的冲动。就在这一夜，我开始了这本书也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这种写作状态保持得很顺利，我完全被它所捕获，一直到大约次年4月全书完稿。以后我也曾写过并出版过多种作品，但能够全身心进入并体验写作中的激动或痛苦的，却再也没有发生过。我把这本书视为自己年轻时代的最后证明。现在我仍想这样说，这是一本年

轻的写作者写给年轻人看的“青春读物”。当然，它是一本关于鲁迅的书。

书写完了，答辩也通过了。跟着就是毕业，不久又获得了学位。但正如我有点预料到的是，它的出版遇到了麻烦和阻碍。有位审稿者对这本书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完全的否定意见，而且，在审稿意见中明确判定了它的严重政治错误。我陷入了无奈和苦闷之中。有一天，我去导师钱谷融先生家中不禁谈起了这本书出版的挫折。钱先生说：“要是在以前，这样的审稿意见是会毁了一个年轻人一生的。你应该到出版社去跟他们说清楚。”这话提醒也鼓励了我。于是，我鼓足勇气去找了出版社的总编辑曹伯言先生“据理说明”。曹老师审看了全稿，事情很快便有了转机。但我也必须做出妥协。结果就是删去了约三万字的段落和字句，同时增加了一些当时在我看来是“画蛇添足”的注释和文中说明性的句子。这样，全书毕竟未遭太大的改动。书出版了，书名一仍当初论文的题目，叫《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写到这里，我必须再次对曹伯言先生表示感谢。他多年研究胡适，在胡适还没有像后来那样一度“火”起来的时候。

其实，在我写完这部论文后不久，自己就已经察觉到了它的严重偏颇。当时检讨起来一是它的理论冲动远未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感性的、情绪性的思考大大压倒了严格的学术理性，这表明了我思想的有限性及作为一个合格的学者在学术研究素质与能力上的欠缺。二是它在研究方法上的生硬和“食洋不化”，许多文字显得极端或矫情，大概可以视为“真诚的幼稚”。现在我也还是这样认为。我曾经想再另写一部鲁迅的书，多少纠正一下这本书的偏颇，但终于没有这种机会，因为很快我便陷入了其他的写作中，丧失了原先试图再度写作的冲动。但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又写了一本《鲁迅评传》，是应“国学大师丛书”之约而写的。这是一本与原先的写作完全不同的类型的鲁迅研究著作。结果证明，我并不能胜任为“国学大师”的鲁迅学术作传。此书令我更加汗颜，此处略过不谈。

1994年至1996年间，我作为鲁迅研究者应邀到日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以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去东京大学等校访问研究。我的身份使我在日本及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又重操旧业，新写了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这时我对鲁迅的看法特别是观察角度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简单说来，即我更愿意看到一个洞穿了黑暗与绝望之虚无的怀有光明希望的鲁迅形象。在

《鲁迅个性心理研究》中,我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分析,尝试证明虚妄或虚无在鲁迅的思想与精神世界中的价值地位。但在九十年代中期,我更关切的是鲁迅走通虚妄或虚无之境的思想意志。这在《野草·过客》中应该有准确而明晰的表达。夕阳下独行的过客想要逼近或抵达的是超越了坟地和野花的无穷之远的远方。虽然是无穷之远的远方,但过客惟一的选择仍然是决不回转去的前行。在这里,远方的虚妄或虚无,已非关键所在,勘破虚妄或虚无之存在的思想、意志及其行动,才是《过客》的主题。同时,正因为是“无穷之远的远方”,它就将是不可言说的,即不可能用语言来说。“不可言说”在此摆脱了语言表达有限性的囚笼。而“向着”这无穷之远的远方的前行者,实际上承担了我们内心希望的使命。于是,我看到的是一个内心满怀光明、温暖与喜悦的希望者的鲁迅形象。超越了世俗的情感或价值诉求,“他”向着不可抵达的、无穷之远的远方(彼岸)前行,但这执着“前行”的姿态,却又证明了“他”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不懈的生活追求。说起来,这虽是我的鲁迅观的一点小小的变化,但它终于能够使我释怀。在某种程度上,我在鲁迅身上找到了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不过,对此我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字。在我想来,不管怎样,至此我也已经完成了自己对于鲁迅的基本认识。研究是无止境的,但我对这个话题似乎已经感到身心俱疲难以再有作为了。现在旧著重版,倒也算是一种了结。

十几年前,在我刚开始动笔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鲁迅的作品几乎就是为我们这样的时代而写的。从大学二年级起,我听从复旦中文系王继权老师的教导第一次完整地阅读《鲁迅全集》,迄今为止,鲁迅的著作仍是我读得最多的书。我想,在我的心底里大概是有一种“鲁迅情结”的。年轻时代留下的种子恐怕一辈子都会在那里暗暗地萌动、生长。即使要造一座坟把它埋住,坟头上也是要开出几枝花或野草来的吧。仿鲁迅所说的,我就把这书的重版也当作是造一座坟,一为了包容自己的过去,二也试看以后在它周围究竟真否会长出几枝野花或野草。

为了这次的重版,我又重新通读了一遍全书。除了改正错别字外,原先的《鲁迅个性心理研究》正文部分一仍其旧。但因增加了附录的几篇文章,我将业师钱谷融先生为原书所作的序言割舍了;同时,对审阅我的这部博士学位论文的几位老师的“鸣谢”也删去了。附录的几篇文字主要写于九十年

代中前期,其中一篇源自《鲁迅评传》,它们都曾在当时公开发表过。虽然这些并不是我有关鲁迅的全部写作,但它们都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作品。这次重读,我仍稍稍感到吃惊:自己曾有过如此毅力这么长时间地写过阅读鲁迅的书。真有点今昔之叹呵。

东方出版中心的李丹梦小姐前些时建议我重版这本书,她的话击中了我心里许多年来都一直有的一种希冀。当初我确实想借一次重版的机会修订一下这本书。但静下心来要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修订”将无异于新写,而这在最近几年里都将没有时间上的可能性了。与其修补式地修订,还不如一仍其旧吧。再说李丹梦小姐对这书的“好感”应该也是缘于它的旧时容貌吧。不过,因内容多少已有不同,就改用了现在的新书名。我现在最大的奢望是这本书会有它的年轻读者。

2005年9月28日

引言

自然以及自然法则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降临于世！于是世界一片光明。

——[英] 蒲柏^[1]

我很早就有机会读到蒲柏的这几句诗，它们所引起的感觉如同我在《圣经》中看到的那样——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其肃穆庄严的语气和无可争辩的力量，一下子便征服了我的灵魂。我所有的只是对于某种世间少有的伟大与崇高之物的遐想。这样，直到有一天，当我还是一个年轻大学生，偶然从图书馆林立的书架上取下厚厚的封面印有《鲁迅全集》的书，扫去蒙在上面的一层灰尘，一卷卷读完它们以后，便仿佛有命运在暗中操纵我一样，我开始再也摆脱不掉内心的激动与不安了。我感到我的心灵第一次与一个杰出的伟人的心灵有了一种直接的交流和感应，并且，我确信我已经能够体验到他的喜怒哀乐等等情感和心理。久而久之，这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梦幻，一个使我不断萌生出希望与痛苦的梦幻。与此同时，鲁迅也成为精神上的偶像。

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一种预感，也是一种蛊惑。每当万籁俱寂，我在暗夜中仰头凝视那幽深而又神秘的星空时，伴随着心灵的颤栗，这种预感、这种蛊惑，就分外明显，分外强烈。灵魂似乎已经脱离了躯壳，正向着那悠远的星际和宇宙飞去，渐渐地，心底的冲动苏醒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欲望开始驱使我一步步堕入激动的痛苦中。我知道，预感逼近了，蛊惑就在我的眼前，但我却为即将到来的一切感到焦虑和恐惧，尽管我早已为这一切投入了我所有的精神和情感。这种惊喜交加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

在犹豫中等待着抓住那使我全身心关注的东西，“我象一面旗被包围在辽阔的空间。/我觉得风从四方吹来，我必须忍耐，/下面一切还没有动静：/门依然轻轻关闭，烟囱里还没有声音；/窗子都还没颤动，尘土还很重。”^[2]我期待着能够早日实现心中的预感，同时却又惧怕这种预感的实现之日，正是我生命之火的燃尽之时。希冀与恐惧相交织，与日俱增。只有回到鲁迅的世界中去，只有重复与这位绝世伟人的精神交流，才能摆脱这种折磨，暂缓内心的煎熬。于是，既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也为了能更深入地倾诉我内心的体验，我必须开始我的自白。恰如里尔克的诗句：

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

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儿

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3]

然而，一旦我试图通过理智来把握住自己的情感，想告诉人们，鲁迅——我所看到、感到和体验到的鲁迅——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时，许多奔涌而至的互相矛盾的想法却又使我欲言又止了。“鲁迅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们心自问。毫无把握。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从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出现了鲁迅这样一个物以后，便有无数的人试图塑造出他自己心目中的鲁迅形象。其中，既有像毛泽东这样的一代伟人，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有默默无闻、不知姓名的凡夫俗子。曾几何时，鲁迅一度被供奉在神灵的宝座上受一些人顶礼膜拜，一度又被人弃如敝帚，望而生厌，著作上积满灰尘，无人问津。鲁迅受到过许多人真诚的爱戴和崇敬，也遭到过某些人的利用和扭曲。鲁迅既被人视为革命家和战士，也以他的著述与创作保证了他作为一个学者和作家的地位。鲁迅的文字曾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先进思想和进步文学的典范与楷模，但也有人对此并不以为然。一些激进者或许会这样说：“鲁迅之所以如此高大，只是由于其他人过于矮小的缘故。”诚然，这不也有理吗？在鲁迅的画像中，他总是神色严峻地凝视着前方，仿佛时刻都在面对着敌人，殊不知鲁迅也有这样的诗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4]鲁迅是豁达乐观的，但他有过悲观、



为斯诺编译《活的中国》所摄之一(1933年5月26日摄于上海)

厌世乃至绝望吗？鲁迅的笔锋所指，所向披靡，但他就没有过受挫感和失败感吗？鲁迅是反封建的勇士，但他又为什么竟不得不屈从于母命，与一个他并不相识，更谈不上爱的女人在传统的鼓乐声中拜堂成亲呢？了解鲁迅生平的人，都可以体会到鲁迅是多么的乐于助人，与人为善，但同时却也能够发现，在鲁迅的天性中又有着多么明显、深刻的猜疑和攻击倾向。鲁迅的生活范围相当

广泛,由于他的巨大的感召力,所到之处总不乏追随者,有的甚至还成为他终生的朋友和崇拜者,但读了鲁迅的全部著作,我们分明又能感到他是多么的寂寞与孤独!鲁迅是生活的强者,他从未在危难面前屈服过,但是,在他生命的全部过程中,在他精神的深处,他有没有感到过某种压抑或者说无法逃避的宿命呢?作为一个文化伟人,无疑,鲁迅的人格同样是崇高伟大的,但在广泛丰富的心理内容中,鲁迅可以说是白璧无瑕的吗?鲁迅是一个自信、高傲的人,但他也有自卑感吗?鲁迅是一个孝子,他曾为祝贺母亲的寿辰而捐资刻印《百喻经》,但他对于父亲的感情也是这样虔诚的吗?鲁迅是一个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人,但他的生活分明又过得如此的沉重与郁闷,多的是沉思与独饮,少的是无所顾忌的休息与放松,他究竟摆脱不掉什么又承担了呢?鲁迅渴望爱情吗?爱情又使鲁迅获得了什么?终其一生,鲁迅始终涉足于社会革命与文化斗争的战场,他曾同晚清的革命者、热衷于暗杀的会党领袖过从密切,也与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和领导人有过交往,在他不同时期的朋友中,有保皇者,有无政府主义者,有民主斗士,有军人、政客,也有国共两党党员,但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他始终未曾完全直接地卷入政治角逐的漩涡中心。鲁迅始终保持了他社会批判者的身份和立场,虽然也有着明显的倾向性,有些文字的政治参与性极强,但最终都未曾改变他的基本角色。这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不是一个独特的形象吗?而这对鲁迅来说,又说明了什么呢?鲁迅生长在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成年以后,又长期与古代典籍为伴,但是在骨子里,鲁迅对这一切是多么的憎恶!“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愤激之辞几乎宣告了他是在强迫自己偏离和背叛自己的文化传统。他希望自己成为叛逆者吗?他将如何正视和解决自身的矛盾与痛苦呢?

凡此种种,包括我们现在所意识到的和未曾意识到的,能够肯定的和值得怀疑的一切,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鲁迅的精神、个性和心理特征呢?我又将怎样来勾画出鲁迅形象的轮廓呢?

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渴望生活》^[5]的作者欧文·斯通曾经这样说过:“文森特·凡高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单独地生活,没有朋友与同伴。可以与他推心置腹的人,可以向他讲述自己的欢乐与痛苦的人,可以与他分担自己的愿望与梦想的人是很少的。……他的心里充满着从观察大自然中得到的美的感觉,充满着从一个农民的脸

上发现的深刻的人道主义；他怀着满腔热情，渴望着有一个可以谈心的人，与他聊一聊自己的动荡不安的生活与缓慢地熟练起来的技艺。但是毕竟还有人能够诚心诚意地把他看作一个朋友，能够理解他的所说所为。”^[6]在中国现代，如果以生活的艰辛坎坷、个性的冲突矛盾、心灵的抑郁孤独和人格的崇高伟大而论，那么或许就只有鲁迅才能够符合欧文·斯通的这些评述凡高的话了。但是，如果说凡高在他的一生中毕竟还有他的弟弟——亲爱的提奥——可以倾吐衷肠、得到灵魂的慰藉的话，那么鲁迅，究竟得到过谁的理解呢？这种由心灵上的孤独而带来的意识深处的被弃痛楚，或许是凡高等人能够体会而又没有完全体验到的吧。我并不想因此说鲁迅比凡高更为不幸，但却不能不说，鲁迅的心灵有着比凡高更加顽强的对于痛苦的巨大张力。既像在地狱的门口徘徊，又像在天堂的阶下流连，一边是黑风萧瑟、阎罗狰狞的冥界，一边是风和日丽、菩提低垂的乐园，鲁迅闯入了但丁《神曲》世界的两极。他是多么想走进那诱人的伊甸乐园！但仿佛是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偷吃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的子孙，鲁迅终于带着一种负罪的心情堕入了命运的苦海。冥冥之中，他跪在审判者的脚下，喃喃地诉说着灵魂的不净和祖先的罪孽。审判者那种犀利而蕴含着巨大同情与仁慈的眼神压迫着他，他感到了灵魂的颤抖。忏悔，忏悔，无尽的忏悔。这却又丝毫也不能改变他罪囚的命运。他曾期待着能够获得拯救，但是，自我、朋友、社会、爱情等等，最终都无法平息他内心的不安与动荡。惟一永恒的，只是他的悲剧性人生。他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并了解了，在东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一个中国人是如何面对那种“哈姆莱特式”的生存问题：生存还是死亡？归根结蒂，这也正是鲁迅所意识到的内心冲突的核心，即鲁迅人生悲剧的核心。

鲁迅是怀着一种受到伤害的心情走向人生、社会的。田园诗般的童年刚刚开始，忧虑重重的生活便催促他进入了少年的时光。如果说祖父的入狱和父亲的病逝使他幼稚的心灵曾为家庭的不幸而感到悲伤，那么，被称为“乞食者”的轻蔑和长辈亲朋的倾轧以及乡邻的流言，还有那药房与当铺间的连年奔走，则使他过早地尝试了还不能完全理解的人生酸苦。在他刚出生时，按照乡俗，母亲就把意味着人生五味的醋、盐、黄连、钩藤和糖塞进了他的嘴里。可她哪曾想到，这种象征性的尝试并没有给她的儿子留下任何记忆，却预示

了他难言的未来。鲁迅对人生的印象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7]

但是，对鲁迅少年心灵的影响又何止是这种世态的炎凉。弥漫在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周围的封建传统意识氛围，几乎在他童蒙未开之时，就形成了一张无形的巨网，企图把他永远地禁锢并扼杀在其中。而对着这一切，鲁迅又是被多少沉重不堪的感情矛盾所纠缠，压迫得几乎只能露出一种扭曲的温情和绝望的喊叫呵！

像任何一个封建家长一样，祖父的阴影牢牢地统治着周家的一切。即使被捕入狱，鲁迅仿佛也能听到他那无声的训斥，感受到他那种怪戾暴躁的脾气。他似乎并没有对鲁迅成年以后的生活产生多少直接的影响，但他却造成了一种令人压抑的家庭气氛，特别是，他还造就了他的儿子——鲁迅的父亲——的悲惨命运。而后者给予鲁迅的是一种多么难以言传的影响呵。鲁迅对于父亲的感情，是一个很难道破的谜。它是那么微妙，那么复杂，那么难以把握，又那么无法形容。既不是一种纯真的爱，又不是一种偏执的恨，也不是一种委婉的责备。有谁能够确切地体味出鲁迅那句一直未为人所注重的话中隐含着的内心衷曲和感情色彩：“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8]直到许多年以后，父亲的言谈举措还是这样的清晰：在一个儿童兴高采烈地跳着正要跑去观看他渴望已久的“五猖会”时，突然响起了父亲那严厉甚至冷酷的声音：“去拿你的书来。”这难道是仅仅用一个“父权”就能完全解释清楚的心理世界么？“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9]我想鲁迅可能是忍受着强烈而又不愿道出的隐痛，咽下了后一句：“这其实是一个父亲对儿童美好天性的残酷虐杀！”更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鲁迅在《父亲的病》（《朝花夕拾》）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对于父亲的歉疚和朦胧不定的感情色彩。在对沧桑人世的感慨和洞观的背后，不知隐藏了鲁迅多少滞重的记忆。谁能够真正地相信，继承了祖父的暴戾脾气而又身患痼疾的父亲，在鲁迅少年的记忆中留下的会是一幅亲切慈祥的肖像。那么，鲁迅的生命重心和感情依托到底在哪里呢？

从刚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在鲁迅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支撑着破败的家庭，养育着一群年幼孩子的忍辱负重的形象。作为长子长孙，鲁迅多么想分担一点家庭的义务，分解一下母亲的操劳。这种本能的责任心使他对母亲充满了一种深

沉而又复杂的爱。这种爱并不仅仅是一个儿子对母亲因血缘关系而生的孝心之爱,其中还掺杂着某种感激、愧疚、自责甚或重负般的感情。在他的生命历程中,鲁迅始终没有完全从这种对于母亲的特殊感情中解脱出来。可以想像,当母亲变卖首饰、凑齐八元川资塞到鲁迅手中说:“我们绍兴有句古话,叫做穷出山”时,鲁迅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在一个伟人的背后,总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但是,同一个母亲,却分明又给鲁迅造成了一种多么沉重的打击啊。封建婚姻的枷锁正因为是这样一位母亲亲自戴在了鲁迅的身上,才使他终于丧失了反抗的勇气。凭着他和母亲之间那种天然的精神感应,鲁迅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也能听到那个无法抗拒的声音:“唉!你们两个就在一块儿过吧。”人生最难以承受的不幸就这样无情地降临到了鲁迅的身上。鲁迅实在是太爱他的母亲了,这种爱甚至使我有可能会认为:它正是鲁迅情感意识中某些痛苦和不幸的根源。然而,我却又因此能有充分的理由指责鲁迅的这种爱,以及他在这种爱的负担下所感到的悲哀么?在鲁迅寂寞孤独的一生中,在他对灯枯坐的深夜,在他独战漫漫长夜的间隙,在他抨击国民黑暗灵魂的时刻,在他身遭追捕的危难关头,这种对母亲的虽然带点苦涩和哀愁的挚爱,这种对一种理想化了的母亲形象的感情维系,对鲁迅生命的延续和信念是一种多么重要的力量呵!他的生命几乎早应耗尽,但是这种爱却使他能够在暗淡的生活中看出一线微弱的光亮。这线光亮不仅使他为之伤感、为之忍泣,而且也使他为之欢笑、为之牺牲。母亲在她所造就了的儿子身上无偿倾注了自己最宝贵的心血与汗水。鲁迅是意识到这一点的。并且,也正因为这种意识是如此的强烈,才迫使他不能不喝下母亲为他酿就了的人生苦酒。婚姻,悲喜交集的一场婚姻,给鲁迅尝到了这杯人生苦酒最难以咽下的一口。从此,他便陷进了一个几乎囚禁了他整个身心达二十年之久的阴暗牢笼。“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10]没有爱的婚姻,即使有那么一点点苦涩的爱也好呵。于是,被剥夺了爱与被爱的权利的鲁迅,当后来真正的爱神来叩响他的心扉时,他竟有些怀疑了:我还能爱吗?我“配爱那一个人”吗?而他最后带着一种决斗般的宣战语气说“我可以爱”时,倒使人有些惊异了:这究竟是自傲还是自卑?或许,只是这两种心理的交织混合,才构成了鲁迅爱情生活中那仅有的一丝甜蜜吧。

鲁迅又是一个被故乡抛弃了的游子,但这却使他惊喜地发现了另一个

世界。在他还没有完全认清这个新世界的时候，一种朦胧的愿望已经悄悄地冲淡了他内心深处时隐时现的对于故乡的离愁：在大洋彼岸竟会有这样一个叫做赫胥黎的人，端坐在窗前，冥想人类的历史。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也就在这个时候，昔日的对于传统教育的本能厌恶变成了一种有意的抛弃。在当时的鲁迅看来，丢掉这样一件东西是多么的轻松呵。他似乎还来不及思考自己与传统的关系，便不自觉地被卷入了整个民族精神的大动荡中。在那个东邻岛国，欧洲的近代文明浪潮洗涤了鲁迅的整个身心，他成了一个真正的个性主义者。“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11]一闪念中，鲁迅也想成为一个以拯救国民灵魂自命的“超人”？然而，在故国的土地上，他却失望地发现，那些久违了的熟悉面孔对那根倒垂着的辫子实在是太留恋了。皇帝没有了，皇权的象征却依然存在，只不过用根竹筷将它盘在了脑后而已。

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咄，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12]

而且同时，一种更为强烈的意念也使他终于仅仅止于对于“超人”的期待和呼唤。几乎经历了近十年的暗淡岁月，就在“五四”前夕，鲁迅仿佛一下子意识到并明确了自己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所应担负的罪恶，和为建立中国现代的新文化所应作出的牺牲。这就是首先在《狂人日记》中出现的“原罪”意识。^[13]从此以后，血液中的不洁和它的不安流动，便伴随了鲁迅的一生。这种深刻的“原罪”意识使他的生活开始真正具有了一种悲剧性质：他并非想成为“超人”而不能，恰恰是他意识到不能成为“超人”却试图作出某种努力。那么，这种人生悲剧的根源不正潜在于鲁迅对自己个人生活的那种过于敏感而偏执的自我意识中么？故乡渐渐隐没在暗灰色的夜幕中，但是故乡的一切并未与他永诀。“我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新人吗？”或许，鲁迅会这样时时自问。不幸，每次的回答几乎总是否定的。而这种拷问却成了鲁迅一生的思想和心理负担。因此，鲁迅虽然一生都在探究着中国“国民性”的症结，但他同时也始终都在更痛楚地播弄着自己内心的伤口。并且，与其说鲁迅是对国人愚昧思想的失望和悲观，倒不如说他首先是出于一种对自

己个人命运的反抗和挣扎。早期“超人”式的个性主义理想的破灭则使他加剧了这种倾向的极端发展。“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黎明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

但是，如果说鲁迅的生命悲剧仅仅在于他内心深处的那种自我矛盾，那么“超人”的理想本身便只是一种自不量力的作茧自缚。鲁迅的悲剧实际上也体现了更深刻和更广泛意义上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时代的冲突，即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个“先觉者”的现实遭遇及其命运。

鲁迅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伟人，但是先觉却往往与孤独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民众的愚昧更使他感到了思想启蒙的沉重困难：中国实在是太难以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几乎也要流血。因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14]他虽然举起了投枪，并且正中敌人的心窝——“然而只有一件外套。他却在无物之阵中衰老，他终于不是战士。”^[15]鲁迅终于发现，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软弱和渺小。“无物之物才是胜者”，“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16]鲁迅这时真正感到了一种“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和绝望。“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17]现在再空喊“救救孩子”的呼吁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以前还曾耿耿于“超人”与“庸众”的对立，那么现在这种“对立”却只能是对自己的嘲弄：“超人”的力量在哪里呢？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超人”，并且，中国也不会产生“超人”。于是，心灵的创伤无法弥合，受挫感和失败感越来越强烈，鲁迅的意识中也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悲哀、孤独而且愤怒的影子，以至于他不能不借助宗教故事来宣泄这胸中的郁闷与惆怅：

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

“我的上帝，你为甚么离弃我？！”^[18]

这是一种深重的绝望。但是，鲁迅又难道是想把自己扮演作一个牺牲者的角色而聊以自慰么？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的自尊心第一次受到了伤害。即使是一个最善于自欺的民族，这时也不会再心安理得了：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经过

了一段并不漫长却颇为曲折的历史，终于，在二十世纪初，“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思潮第一次真正席卷了中国的古老大地。“中国必须变了！”就像一阵飓风，引起了猛烈的骚动。其中，鲁迅率先发出了旨在近代启蒙的激进“个性主义”的呐喊。然而，“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垢，苟被其谥，与民贼同。”^[19]于是，在鲁迅的意识中，中西文化的冲突突然之间也变成了自己与社会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的难以调和，不仅使他加深了对于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禁锢的民众的否定，还使他终于产生了对自身的怀疑。一方面是他的“独异”和“对庸众的宣战”，他只能一个人在新旧两个战场上“荷载独彷徨”，“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20]另一方面，则是执着的自我反省和负罪般的自我意识。有时他甚至会认为，“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既向“黑暗与虚无”“抗战”，同时却又深深地感到“绝望”；他的所谓“反抗”，其实“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而已。^[21]所以，几乎把人类的罪恶都背负在自己身上的鲁迅，虽然“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随着一场“超人”梦幻的破灭，鲁迅体验到了一种被自己所抛弃的绝望。

在鲁迅的一生中，他对民众的批判是激烈的，但他对自身的抨击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于还近乎残酷和自虐。深刻的孤独加剧了鲁迅对于自己的绝望的否定，而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负疚感和罪恶感又明显强化了他内心的不安与抑郁。他时刻生活在一种过于紧张的对于个人命运的“绝望的抗争”中，并不断地在一种献身的崇高却痛苦的精神状态中，独自舔舐着自己的心灵创口。“人往往以神话中的 Prometheus 比革命者……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22]我想，这里已无所谓“希望”，实际上也无所谓“绝望”。如果说其中还多少隐隐地流露出某种悲观、低沉的情绪，那么这又是一种多么深刻而伟大的悲观！

鲁迅的一生几乎都在“煮自己的肉”。从他呼唤“超人”时起，他似乎就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23]而他去世前不久所写的那篇著名的自白《死》，则简直可以当作鲁迅精神个性的最后闪光。它表现了鲁迅一种超乎一切的坚韧与伟大：“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